

它。从个人而言，我也是一个互联网的受益者，它既使我能与天下大事不脱节，又能帮助我保持思维敏捷，不至于得老年痴呆症。当然，天下大事如果看好，令人高兴；如果是坏事，也免不了让人为此忧心重重。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已无能为力，但却已养成了这个痼疾。

进入老年以来，因为没有什么外来的任务压在身上，就有时间去感悟自己的人生。有一年，我去访问我所敬佩的周恩来在绍兴的故居，看到他用以自勉的格言是：“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这两句话，从此也成了我前进的方向标。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就更深切体会到此中的真理。只有无所求了，才能知足，才能快乐，品位也才能高。我的网友

中，有这么几个热心人总是不辞辛劳地定期将杂乱的信息整理有序转发给友人，我就是受惠者之一。于是，我也向他们学习，将有益的信息、特别是有利于人们增进健康和修养的珍贵资料，及时地转发给我的好友。事情虽小，也算是助人为乐，心里也感到一点安慰。

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在网上发表文章说：“老人，活的就是一种心态”。我全心全意地支持他这一精辟的观点。

苏东坡说过：“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他还说：“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个大文学家对人生的看法，多潇洒！

一切顺其自然，享受人生，足矣。

我有幸参加了澳门回归的筹备工作

○周礼杲（1953电机）



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钱其琛主任接见周礼杲（左）

澳门是16世纪中叶以后逐步被葡萄牙人占领的。初始在1594年，葡萄牙人曾在

澳门建立了一所圣保禄学院（圣保禄大教堂），它是远东地区第一所西式大学，不过时间不长，该学院后被大火焚毁，至今只留下其门楼，俗称“大三巴牌坊”，几百年不倒，成为澳门今天的地标建筑，游人必到。直到1981年香港人来澳门创办了近代第一所高校——私立东亚大学。1988年，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澳门将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中国，澳葡政府才决定要建立澳门的高等教育，于是将东亚大学收购过来，进行改建调整。将大专部分分出成立（公立）澳门理工学院；将成人教育的东亚公开学院分出成立（私立）“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现

□ 回忆录

改组为“澳门城市大学”)。而东亚大学的主体部分,包括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部分均留下,在1991年9月正式改名为(公立)澳门大学,并对澳门大学进行了扩建,急需教授和大学管理人才。当时澳门大学通过澳葡政府向中国教育部提请支持。教育部就根据清华大学的推荐,向澳门大学作了推荐,不久教育部很快正式通知清华大学公派我应聘前去澳门大学任教。我即做好准备前赴澳门大学工作。但那时我只理解澳门有需要,清华电机系和大学的领导信任我,要我前赴任教。但对澳门和澳门大学尚一无所知,具体的都不清楚,只知要立即去讲什么课,同时要做科技学院副院长的行政工作。到临行前,清华大学两位副校长(杨家庆和倪维斗)和我谈话,嘱咐我去澳门大学工作,除要认真完成澳门大学给予的任务以外,同时可尽量为清华大学在澳门建立一个窗口,以便发展清华大学与澳门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关系。我就是在1991年10月私立澳门东亚大学刚刚改名为公立澳门大学时到达该校的。

为迎接澳门的回归培养好本地人才

当时我对国家要派我到澳门大学工作的意义还理解不深。不久,时任新华社澳门分社的社长郭东坡,在当年春节时请我们(仅2-3位内地公派来的教授)吃饭,郭社长的一席话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至今仍记得。他说:《中葡联合声明》已经签署,澳门已确定在1999年回归祖国,现在距离澳门回归只有8年了。要做到顺利回归就要解决三大问题: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中文官式语言化。核心问题是

人才。这也是中葡双方达成的共识。要实现公务员本地化就需要大力培养澳门的本地人才,特别是华人。葡国统治澳门400多年,澳门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特别是高层,几乎都是葡国人(或土生葡人),华人很少,这样怎么回归?怎么能实行澳门基本法、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回归后主要要由澳门本地人来管理澳门,所以现在到回归的几年中必须加紧培养本地的华人子弟,才能完成此历史任务。这也就寄希望于澳门高校,特别是澳门大学。而澳门缺乏人才,特别是缺乏高水平的教授,所以要你们来,就希望各位教授努力帮助把澳门大学办好,培养好人才(澳门华人),为迎接澳门回归做好人才的准备。”这一席话,确实使我茅塞顿开。至此才真正意识到国家公派我们应聘前来澳门大学工作的深层次意义,使我深感责任重大。

为此,我努力熟悉澳门的高等教育法,澳门大学的法律,向澳门大学前任的校长学习他们的经验,并很好地与一些中国教授(澳门人)团结合作,共同努力办好澳门大学,并且广泛结交葡萄牙教授及美、英、德、日等国的外籍教授。根据我在清华大学工作了约40年的经验,首先办好澳门大学的科技学院,并经常与新华社澳门分社的有关领导沟通,交换意见和请示。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我担任科技学院院长至1994年,澳门总督韦奇立将军正式委任我为澳门大学副校长。之后,于1997年,澳门总督又委任我为澳门大学校长。在1999年10月我卸任澳门大学校长职务时,澳门总督特别颁授我一枚专业功绩勋章,肯定我为发展澳门大学所

做的功绩。

那时，我积极从内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以及别的国家聘请了一些大学教授到澳门大学来任教。在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下，澳门大学有了很大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在1997年我们澳门大学代表团到北京拜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时，陈滋英副主任（他当时主管澳门回归事务）接待我们，当我汇报到，经过我们估算，到1999年回归时，澳门大学总计将培养出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约3000人，并且具有各种专业，包括法律、新闻、中文、葡文、经济、科技、企业管理、公共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我们想，这样能基本上满足澳门的政府各部门的人才需要了，能基本满足回归的需要。陈主任当时听得很认真，并再问我是多少人？我重复一遍说是3000人，他笑了，显得很满意。

参加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工作

1998年初的一天，当时的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约我去他办公室谈话，他告诉我说，中央决定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为澳门回归后成立特区政府作筹备。此委员会共有委员100名，其中内地地方为40名，澳门方为60名，要我任澳门方的一个委员，希望我积极参与筹委会工作，为澳门顺利回归做出贡献。那时我已在澳门工作七年了，这说明我作为澳门大学校长，需要我参加澳门回归的筹备工作。1998年4月，全国人大李鹏委员长为我们每个委员颁发了任命书。我当努力参加澳门回归的筹委会工作。筹委会的主任为钱其琛副总理，筹委会的工作组织

很好，有条不紊。由于澳门的基本法制订得好，吸取了香港基本法的一些经验，所以没有太多矛盾，一切进行得比较平稳。我参加的是社会文化组。

在筹委会最后一次会议（在珠海召开的）上，钱其琛主任宣布，中央认真考虑了澳门的实际情况，决定在澳门回归后向澳门派驻解放军。顿时会场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说明这一决定深受澳门人的欢迎。翌日澳门各报都大字刊出此一喜讯。

澳门社会爱国爱澳的精神很强烈。大家也比较团结和谐，热情地盼望回归。所以在回归的第一天上午，威武的解放军在大批装甲车的引导下踏上澳门的土地时，澳门的广大市民简直是万人空巷前去热烈欢迎。大标语“回归啦”，至今深刻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这说明解放军的进驻是澳门回归的象征，深入人心。

1999年回归时我出席了两国政府的政权交接仪式及宴会。回归以后，参加了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胡锦涛、习近平和温家宝等前后来访时会见澳门社会各界人士的仪式。

当时，我也积极发展开创澳门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合作关系，例如科研项目的合作（如应用卫星遥感来分析澳门的环境污染等课题）、教授的聘用和接待清华大学领导的来访，如清华大学的几任党委书记李传信、贺美英、陈希，几位副校长，杨家庆等，以及其他诸多领导和来庆祝澳门回归的清华大学艺术团等，都曾来访澳门大学，我都加以联络安排和接待。这样就大大促进了清华大学和澳门大学以及后来的澳门科技大学的合作关系。1995年左右，在当时的李传信书记的鼓励下，我促

□ 回忆录

进了澳门清华校友会的建立。在回归以后，有了一批澳门学生到北京清华大学读书的毕业生，就改组了校友会。他们本来都是澳门人，年青很有活力，我作为名誉会长也积极参加他们组织的各项活动。

在1999年澳门回归前后，在特区行政会成员廖泽云先生的邀请下，并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铨和现任特首崔世安的支持下我离开了澳门大学，前来创建一所新的私立的“澳门科技大学”，任创校校长。这所学校当初是在一无所有的平地上创建的，但是以高起点、高速度、高水平的精神来创办的。2000年就开学上课，2002年就建起了新校园。至今美丽的校园受到大家的称赞。学院数目从4个发展到了7个，学生人数已经达到在校人数8000多人。与

澳门大学基本相等。

在2001年，澳门特区政府第一次向社会人士颁授奖章和奖状时，何厚铨特首就给我颁发了“荣誉奖状”，对我在澳门高等教育界的工作作了肯定。

现在我已退下校长职位，原来一直担任澳门科技大学校董会副主席。2009年9月又被委任为澳门科技大学校董会主席至今。澳科大希望我还能继续为澳门科技大学进一步的发展作出贡献。我将尽我的努力再为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出一份力。

今年清华电机系迎来80周年大庆。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我要感谢清华大学的一些领导和老师们，当年给我们的培养和教诲，使我们受益匪浅，永世不忘。

我与清华工程物理专业的情缘

○刘广均（1952物理）口述

编者按：刘广均，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我国著名同位素分离专家，曾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同位素分离教研组主任，1963年调入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504厂，参与完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供料任务。1982年调任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总工程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是如何进入到 工程物理专业领域的

我1929年7月15日出生于天津市一个回民家庭。1948年夏天我刚读完高中二年级，就以北京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

大学物理系。1952年我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教普通物理。1956年，清华大学根据国家需要，决定成立工程物理系，为国家培养原子能方面的人才，从学校其他专业和物理教研组抽调了一些教师，我就是其中之一。

首任工物系系主任由学校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同志兼任。他对工物系的筹建工作抓得非常细致。我到工物系后，系里安排我准备开一门原子核物理的课，我是学习物理的，对这项工作兴趣还是很大的。何东昌同志就派我们几个人去北大学习核物理。我现在还记得当年和刘迺泉、陈世